

朱维铮 著

走出中世纪二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朱维铮 著

走出中世纪二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中世纪二集/朱维铮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309-05928-1

I. 走… II. 朱… III. 思想史:文化史-中国-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6943 号

走出中世纪二集

朱维铮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陈麦青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2 千
版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 000

书号 ISBN 978-7-309-05928-1/K · 222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辑集的部分文稿，无论未刊或已刊，考察的主题、时限、历史内容和文字风格等，都同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刊行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相似，因而取名《走出中世纪二集》。

既称二集，也就不必复述增订本小引、初版序和英文版序已经交代的诸点。不过辑入本集的诸稿，都属于近二十年的拙作。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犹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每念及《左传》所载这两句古逸诗，都不由得生出一种紧迫感。因为那时我重返教职未及十载，而行年已逾“不惑”，将届“知天命”矣。经历过七十年代的生死煎熬，我重读古典诸子，既欣赏《庄子》那种冷眼看世界的态度，也赞成《老子》所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说法，以为从业中国史学，应该自明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准的缺陷，不可已尚昏昏，便欲令人昭昭。自己不懂的东西决不应乱讲，而曾经走错的路、说错的话，就应承认。只有如此自胜，才可能在回顾历史的时候看得更深更远一点。有同行称我的治史态度为“低调”，在我闻之欣然。

孔子曾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如今我活过那把年纪了，却仍然不明白孔子的“矩”指什么。或说这话表明孔子年至七十，已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但正如惠施批评庄周



所说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无论出身、地位或信念，我都进不了孔圣“汝为君子儒”之列，当然也做不成孔子之徒。

问题是如今还有人要求我辈做孔子之徒，可谓古怪之至。人们常说这个世界变化快，那是真的。就看最近二十年，人类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村”，内部变动态势岂非翻江倒海？然而，作为地球村内人口最多的大户，如果不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从根本上清除障碍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生态基础，反而不恤民脂民膏，编造孔子儒学足以淑世之类的神话，岂不既古且怪么？

不妨重述《庄子》的一则寓言。它说庄子见鲁哀公，谓鲁国“少儒”。鲁君不服，说“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建议鲁君进行测谎试验，办法便是在国中发布号令：“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结果，号令发布五天，“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于公门。”这则寓言显然是对孔子为政必先正名的讽刺，强调“名者实之宾也”。假如恪守当年拨乱反正的真理标准，鼓励许诺多年的双百方针付诸实践，那不也可使某些凭借唯上唯书的投机无知之徒清醒点么？

我既非儒家信徒，却不幸选择了中世纪经史学说当作从业对象。于是二十年来，一如既往，授课不离经学史或史学史，编书作文也总在中世纪文献堆中转悠，而且时时被研究生们的课题牵住鼻子，不得不跟着去读前修时彦那些新旧论著，以致迄今仍属杂学者流。又为遵守学校规定，或难拂报刊盛意，偶将学思一得形诸文字，积累多年，七长八短，又近百篇。若干所谓专题论文，当另作处理。若干札记、考辨之类，原为备忘，连自己也往往想不起当初为何而作，也不宜公表。结果呢？在编校完毕《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之后，再编本集，便为文稿的取舍，颇感踌躇。

筛选辑入本集的文稿，主题还是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中

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题材也仍为那三个多世纪的思想文化史若干问题。但恰在这个专门史领域，近六十年来既有的成说最多，受新老权威意志影响的所谓主流史学观念表现分外顽强，因而中外有关论著，在这里的认识分歧也最为复杂。例如说到“乾嘉汉学”，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出现意识形态权威对它进行彻底否定的指责。以致很长时间，人们对它骂声一片，连带人文学科的所谓为学问而学问，也似乎犯了原罪。有的论客，“学而劣则仕”，连清代经史诸子考证的边都没摸着，就斥责那些学者重“器”轻“道”，带坏了知识界，岂不令人惊异？类似见解，在我看来正是需要争论的历史课题。

由于备尝以论代史的苦果，我始终反对空论式的所谓史学，倾向于择题要征实，虽不能以斑窥豹，至少应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忝居教书匠，我既不习惯“炒冷饭”，捧住旧讲稿念到纸色发黄，也不甘愿尸位素餐。为助正在攻读学位的青年学人一臂之力，涉及任何专题都想先走一步。这使我的文稿，总显得专而杂，却常因过度凝缩而被指难以普及。

其实专门与普及之间并不存在鸿沟。教书需要深入浅出，本身就体现专门研究和简明表达的有机结合。专门研究首贵原创，但从体系到认知，都能发前人所未发，在中外史学史上都只有很少几位大师才做得到。次则能完善或发展原创性研究。再次能整合并在某个领域绍述前人研究，却不事抄袭，也可成“家”。然而拼凑剽窃，乃至依权仗势或者动用国帑劫掠他人成果，这类“专著”虽多达五六卷数十卷，岂非只能正名为“学术垃圾”的制造商或新把头？

普及历史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汉书》以后的正史，《汉纪》以后的编年史，以及改编《通鉴》的“纪事本末”，包括《通鉴

纲目》之类,有几种不是向帝王官员或士人普及权威意识形态的历史教科书?但其中又多有专门史著。随着十世纪印刷术的推广,读史变得更容易,讲史说史在民间也成时尚,甚至影响到边疆诸族。例如满清入关初便以《三国演义》作为教育八旗权贵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的启蒙读物,结果自愚又愚民,一个实例便是慈禧太后,相信自称有关公护佑的义和团,最终将帝国闹完。所以,利用垄断性的现代传播手段,鼓励以假乱真的所谓历史普及,那可能在特定气候下发酵的群体效应,恐怕不止于寻开心。

本集如同初集一样,选辑的也是自以为略有新意又可供非专业人士阅读的文稿,当然也是“散砖碎石的集合”,并略作分类:

第一部分,两篇是未刊的随想与短论的缀合。题作“君子梦”的一篇,以前在大陆没有发表过。

第二部分,十一篇,主要讨论晚清至民国的思想学说史,有两篇首次全文发表。《梁启超和清学史》,原为我校订的单行本《清代学术概论》的导读,因篇末“附释”涉及此人此书有争议问题的史实考订,故仍予保留。

第三部分,四篇,内容均属中外文化交往的历史问题。

第四部分,包括十二篇杂文,或可作谈资。

有同仁质疑,这书既称《走出中世纪二集》,难道还有三集四集么?我不知道。倘若天假以年,当然还会在教书之余写点什么,至于能否另行结集,那只好说“昧者不知也”。

朱维铮

2007年农历丁亥冬至夜三稿

目 次

序/001

走出中世纪/001

——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断想(续)

“君子梦”:晚清的“自改革”思潮/054

清末的现代化思潮/060

——夜读小札

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074

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080

一、寂寞“待访”二百年/080

二、清末鼓动反君主专制的经典/083

三、推崇《明夷待访录》的角度/084

四、章太炎由“非孙”而“非黄”/086

梁启超和清学史/089

清学史的经典性名著/089

梁启超与“五四事件”/092

“迷梦的政治活动”/099

映现危机意识的“心影”/107

徘徊于治学与问政之间/112

并非治清学史的第一人/116

章太炎和梁启超,兼及刘师培/119

非天才的天才论述/122

自己给自己作盖棺之论/124

胡适《自传》的一则附注/128

难讲的“原儒”公案/131

关于钱穆研究/136

钱穆的文化关怀/136

民国学术史的过渡人物/137

新儒家呢,还是史学家? /140

略说钱著《近三百年学术史》/141

钱穆与章太炎、梁启超/145

附记:也说“国学大师”之类/148

令人将信将疑的回忆录/152

——评《银元时代生活史》记章太炎

似已忘却的回忆录/157

《积微翁回忆录》/157

杨树达上告杨荣国/158

杨树达私记陈寅恪/161

叙史的小小尾声/165

索解晚清的民间报人/166

——廖梅著《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小引

杨度的《杨氏史例》/172



百年来的韩愈/174

《伯夷颂》颂错了? /174

曾国藩与韩愈行情/176

严复《辟韩》及其反弹/178

韩愈在“五四”前后/183

韩愈和民国“训政”/185

陈寅恪《论韩愈》前后/186

俞平伯与陈寅恪/191

陈寅恪在劫难逃/193

韩愈成了“尊儒反法”的反面教员/194

对韩愈“一分为二为宜”/196

顺便说到《拘幽操》/197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199

引言/199

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200

耶稣会士向往中国/202

基督教在华梅开三度/204

十八世纪的相反记录/206

马礼逊与太平天国运动/208

从“教难”到“教案”/209

“传教宽容条款”/210

利玛窦的后继者们/213

在华的自由派传教士/215

“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217

剪影与参照/219



晚清上海租界的宗教文化/221

历史展现的特定文化形态/221

光怪陆离的宗教现象/223

新旧基督教/225

两个租界的“自治”/230

新教各差会的“学术传教”/234

仍待深究的课题/239

过去的“风流世纪”/241

——关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与欧洲

龚橙与火烧圆明园/248

——以讹传讹的一则史例

附录：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现场报道/255

现代大学的中国先驱/259

——《马相伯传略》弁言

《壶里春秋》小引/263

“五四”：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267

我看经学与经学史/275

——《中国经学史十讲》小引

关于清代汉学/280

一、三类“汉学”/280

二、名目的确立/280

三、名实问题/281

四、形态问题/282

五、文化比较/282

晚清学术的非传统化进程/284

读《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287

家谱和年谱/294

“国学”岂是“君学”？/298

从儒学史说到新儒学/301

关于马一浮的“国学”/304

——答《大师》编导王韧先生

一、介绍马一浮的“价值”/305

二、关于马一浮拒任北大文科学长/306

三、马一浮与中西文化/308

四、马一浮为何强调“直接孔孟”/311

五、马一浮与复性学院/313

我的书架没有秘密/318

——答《南方周末》编者刘小磊先生

跋/321

走出中世纪

——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断想(续)



“‘满洲’之名必须被理解为包括不同民族群体的政权的名称,同时,它大致也指这些群体的共同文化。”

以上界定,出自《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的中译本(高丙中译,刘小萌校,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原著者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 1887? — 1939),俄国人类学家,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晚年任清华大学人类学教授。据他在清华唯一的及门弟子费孝通为此书所作后记《人不知而不愠——读后忆师》,说他这位老师的学问,远在他另一位老师、在西方人类学界号称首屈一指的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884—1942)之上。

我对文化人类学是外行,但对“满洲”源流颇感兴趣,读过清代若干官方文献,也读过清末民初章太炎《清建国别纪》之类考证,还是越读越糊涂。直到几年前,偶然买到史禄国此书中文译本,发现作者声称是他对民初满人田野调查的产物,于是不

* 序码上接《走出中世纪》增订本首篇(见增订本第50页)。

顾其书过于专门以及行文(或译文)乏味,硬读下去。不料越读越有味,以为消解了多年的积疑。

哪些积疑呢?第一,关于“满洲”的名称,作者证明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始采用的。第二,关于“满洲”的族源,作者证明那是十八世纪雍正《大义觉迷录》才出现的神话,而因乾隆敕编《八旗通志》得到推广,二书均属数典忘祖的作品。第三,关于“满洲”的族属,作者证明它是满、汉、蒙及其他通古斯人的族群联合体,并非曾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后裔。第四,关于“满洲”的政体,作者证明努尔哈赤以后已经用“国家”代替“家族”,血缘结合的家庭已解体,“核心家庭”才构成后金国家的原子。第五,关于“满洲”的文化,作者证明帝国建立者是“新满洲”,表征是“在信仰萨满教的同时既拜佛又崇儒”,而与生活在北部山林中的“老满洲”迥异,后者只信祖宗所传的古法,仍按古旧规矩由萨满跳神祝祷,“根本不拜佛不崇儒”。

史禄国的这些见解,基于上世纪第二个十年他对通古斯人和满人居住地区的多次实地考察,包括对在北京的满族所作的考察。他通晓满人的古近语言,“特别是能够充满敬意地看待他们民族的各项制度”,因而能够发现一个被掩藏的世界。

“但是,那些安居在北京的调查者因为不能进入真正的满族的氛围,所以只能见到军队和政府圈子里的代表人物或那些多多少少与皇室和政府有瓜葛的满族学者。问题在于这种上层社会的组织并不倾向于在利用古老的社会体系时保证满族不与这些地方的汉族完全同化。既然如此,调查人员在短暂的接触中不可能发现满族本来的社会制度。此外,有些调查人员之所以未能发现满族固有的、意义重大的事物,是因为他们对这些‘野蛮的征服者’怀有偏见:他们突然介入,打断了‘中国文

明持续进步的发展’。……因此,这些中国学专家有意无意地因为反感而对有些视而不见,以致未能发现固有的满族文化——这种文化对外人是深藏不露的。”(前揭书“引言”)

以上抄录的一段批评,写于1923年前,距今八十五年了。物换星移,中间也曾有过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民族调查,印行过很多种调查报告,表明那些调查者,至少在某些特定年头,不再安居北京或省会了。效应呢?别的不清楚,单看上世纪中叶以来的清史研究,普遍取向是只承认清初有过短暂的满汉矛盾,往后顶多承认有过几次少数民族的反清活动。为什么直到清末,同盟会仍号召“排满革命”?标准解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不敢提出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特别把板子打在“一民主义”者章太炎之流的屁股上,说他们混淆了斗争的大方向。至于史禄国所谓满清体制内涵泳的古老传统遗存,在我们的“近代史”论著中完全不见踪影。这合乎历史实相么?



前已提起萨满教。由于满洲入主北京,这种在通古斯人中间盛行的信仰形态,也被带入中原。

萨满是通古斯语“巫”的音译。中国人对巫并不陌生。殷代甲骨卜辞已证明,巫是一种古老职业。起先它是女性的专职,后来男性也来争夺,“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屈原的《九歌》,还是给楚地女巫降神所写的颂歌。到西汉末刘歆编定的《山海经》,与天地神祇和祖先鬼魅沟通的职业,已转换为男性控制。需要指出的,是《山海经》中的男巫,已经各踞山头,就是

说已有空间分野。

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早已证明信巫是人类早期社会的普遍现象。从历史上看,它不是中国特色,当然也不是清代北方边疆通古斯语系诸族的独有特色。

然而在十七世纪以前,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早已进入信仰多元的时代。以明朝为例,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曾提倡朱熹的理学,却都强迫朱子学为自己的专制主义服务。证明就是死谥明太祖的朱元璋,对于朱熹诠释的《孟子》,如此憎恶,以致命人删除孟轲原书论及“民贵君轻”之类八十多节文字,方才准许士人继续诵读。明成祖朱棣篡夺法定接班人即其侄的帝位,随即命无耻文士胡广等,重订《四书》《五经》标准诠释,号称两部“大全”。但从根本上说,他们都失败了,由晚明王学的兴旺可证。

因而满洲入主北京,遭到南国士大夫长达二十年的抵抗,又花了二十多年平三藩、征台湾。这使满洲权贵,不敢或无法再将他们的萨满信仰,强行推至全国。

在我看来,清初五十年,满洲顺治、康熙二帝,在征服全国的同时,没能依循胜朝先例,建成“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相反,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宣布独尊他改造过的朱子学以前,这个帝国的真正信仰,即满洲的萨满传统,反而被康熙帝摒诸应当普及全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那答案也在统治意识形态之外。

康熙是满清帝国的第二代君主,在位六十一年,是帝国的真正奠基人。由他开拓的中华帝国疆域,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版图的基准。以后北疆被沙俄侵掠,乃至到民国时期,被新老沙皇侵吞一百余万平方公里,而面积达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的法律归属,对中国人还是个谜。仅此一点,中国读者赞赏康熙大帝,应该说有充足理由。

问题回到统治意识形态。康熙之子雍正在位十三年，其孙乾隆做皇帝连同充当太上皇三年，在位更长达六十三年。就是说，按照西历，整个十八世纪，主宰中国的是晚年康熙和其子雍正、其孙乾隆的全部时期。

这百年在中国史上号称“盛世”。的确，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灭六国算起，到康熙晚年，历时一千九百多年了，中国还从来没有获得长达百年的太平。岂止中国，环顾十八世纪的世界，欧洲、北美不都在战争中间么？更不消说全球其他地区。

犹忆多年前，与已故的魏斐德教授（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学院）多次讨论中国在十九世纪走向没落的历史原因。魏斐德教授说，那是因为十八世纪中国过于“太平”，而当时西方正经历百年战乱。于是我比较那百年的中西历史，越比较越感到魏斐德的说法有理，百年太平导致百年停滞，而百年战乱恰好促使欧洲在竞争中急剧变异。

在前我注意中外历史的可比性，主要着眼于时空连续性。以后又以为，应该也注目于社会文化形态的同时性与历时性的比照。从此遍读域外史著的中译本，尽管也如当初阅读《剑桥中国史》、《剑桥世界史》一样，感到其中不少篇章，平庸淹没杰识，但较诸阅读近年大陆史著，越读越失望的感觉，略胜一筹。

偶读史禄国书，于晦涩行文中发现历史的实相，尤其是关于萨满教的历史界定，感到茅塞顿开，便是一例。



人们常常称道满清的康雍乾“盛世”。单看历史现象，这个